



现代新儒家 政治哲学

刘晓著

线装书局

本研究项目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

刘 晓 著

线 装 书 局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刘 晓著 . - 北京:线装书局,
2001.5

ISBN 7 - 80106 - 077 - 6

I . 现 … II . 刘 … III . 政治哲学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797 号

书 名: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

著作责任者:刘 晓

责任编辑:刘伟见

特邀编辑:康 鑫 邓新华

标 准 书 号:ISBN 7 - 80106 - 077 - 6

出 版 者: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春秀路 10 号 100027

制 版 者:北京九州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者: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大 32 开本 11.8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现代新儒家与政治哲学	(1)
一、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问题及发展脉络	(1)
二、政治哲学：概念、意义和范围	(11)
三、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概念的自我界定	(34)
第二章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41)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论定	(44)
二、道德的理想主义	(53)
三、心性：即超越即内在的根据	(71)
四、性善论问题.....	(105)
五、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111)
第三章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历史叙事.....	(119)
一、中国传统政治形态：道德政治理想与现实 政治.....	(119)
二、政道与治道的概念及解释.....	(127)
三、儒、道、法的治道.....	(132)

第四章 政治	(139)
一、体用模式	(140)
二、辩证显现说与主宰说	(142)
三、生命与理性	(147)
四、权力意志与道德理性	(153)
第五章 国家	(163)
一、文化精神和理性表现与国家社会	(168)
二、个人、社会与国家	(175)
第六章 儒家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	(186)
一、梁漱溟：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	(191)
二、心性本体与民主政治之用	(198)
三、心性开出民主的辩证途径	(205)
四、政治民主与德治民主	(228)
五、限权与主体转换	(238)
六、个人权利与国家社会并重的宪政民主	(246)
七、批判传统与转换传统	(265)
第七章 自由与平等	(274)
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	(275)
二、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284)
三、道德平等与政治平等	(297)
第八章 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307)
一、现代新儒家与保守主义	(307)
二、文化民族主义	(319)

第九章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思想的本源主义	(325)
一、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的紧张	(325)
二、中国思想的本源主义	(327)
三、现代新儒家与本源主义	(351)
四、本源脱魅的醒觉	(357)
第十章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之审视	(361)
一、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特征与困局	(361)
二、如何在与传统的接续中建立现代政治哲学 的基础	(365)
附：主要参考书目	(371)
后记	(379)

第一章 絮论：现代新儒家与政治哲学

本书是对于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讨论。在讨论开始时对论题本身作一些交代是必要的，这里主要包括以中国现代政治哲学主要派别之一的现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的考虑、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和范围及新儒家政治哲学的自我定位。

一、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问题及发展脉络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位置。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文化性的现象，更确切地说，是以儒家身份的自我认同的理想和面对现实的反映。一般来说，现代新儒家的发

展可以划为三个阶段，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 1949 年为第一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马一浮等。在这个阶段，现代新儒家奠定了其思想理论的基本路向。中国大陆解放后到 70 年代末为第二阶段，其中心由大陆转移到香港、台湾，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在这个阶段，现代新儒家完成了其思想体系的全面构建。从 80 年代到现在为第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蔡仁厚等人，他们继续发展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并在海外和国内都形成一定影响。^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思想已经开始成熟且日益活跃的林安梧、李明辉、萧欣义等新儒家的新生代。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持续生存能力的思想流派。

在港台和海外对现代新儒家的系统研究主要是 70 年代初的开始的，张灏的论文《新儒家与当代中国思想危机》、傅乐诗编辑的《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和韦政通等的论著，是现代新儒家研究的较早的重要成果。1982 年 8 月 1 日，台湾《中国论坛》召集“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的主题座谈会，这是一次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重要会议，李亦园、韦政通、余英时、刘述先、林毓生、张灏和金耀基等作为主持人或主讲人发表了他们的基本看法。这次会议推动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进一步开展。^②

80 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文化热”的兴起，现代新儒家一些著作陆续得到介绍和出版，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国内也有了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成果中最为突出的是方克立和李锦全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一

^① 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称谓，目前有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和新儒家的不同称谓，本文采用“现代新儒家”的整体性概念来描述从第一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第二代牟宗三等和第三代的新儒家，此“现代”既是时间性的也是其所面对的问题性的概念。为方便起见，在行文中有时亦使用“新儒家”的提法，在基本涵义并无不同。所列现代新儒家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从其基本特征考虑，对于存在不同的看法本书并不刻意进行辨析。

^② 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507 页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现代新儒家学案》和这个课题组成员的系列研究成果。然而，许多研究者更多地只是把现代新儒学当作哲学的和文化的思潮，在介绍和研究的视角上，也以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为主。我们认为，现代新儒家不仅是一个哲学流派或一个文化流派，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思潮，其思想体系包括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政治思想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可以这么看，现代新儒学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政治思想发展较为系统的一系。

事实上，现代新儒家所关怀的问题不仅是文化，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另一个重要关怀是政治哲学，即在以民主自由为标帜的现代政治转型中传统道德基础的问题。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就是在此两个相关的问题上着力和展开的。

一般地说，现代新儒家既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从第一代梁漱溟等开始，他们就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承认民主、科学的前提下，保存和发展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进程中，梁漱溟、张君劢等一直试图寻找一条超越国共两党的第三条道路。大陆解放后，张君劢等继续在海外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活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口号，系统地从事理论著述，并且构建其政治哲学的体系。80年代以来，海外第三代的新儒家发展了其先驱者的思想，大力宣传“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的口号，并以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起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来论证儒家思想传统是东亚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源泉和动力。这样看来，现代新儒学是一个有长期影响的政治思想派别，对其影响不能低估。

对于现代新儒家，政治与社会的环境与传统儒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世界早已不是分割的文明体系，现代化的浪潮冲击着每一

个角落，在政治形态上，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而现代的民主政治携着巨大的社会经济的成功，对所有的政治体系发生不可抵抗的影响。然而，不应当把这种政治形式的扩张视为仅仅是统治或者管理的效率的变化，政治的民主化更主要的是反映现代世界的政治合法化的要求，实际上民主政治的成本倒是相对高的。现代民主政治当然不是单纯的形式构建，它是人类的政治精神的制度体现。问题是，它在什么方面和如何体现人类的政治精神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与政治形式的关系如何。这也就是现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从我们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说，是政治哲学的问题。

相当多的人认为，民主政治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逻辑的结果，而其他的文明传统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分歧在有人认为，民主政治应当上溯到古希腊，也有人断定现代的宪政民主只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① 但无论如何，西方文化开出现代民主，已经成为普遍的看法。这就给迈向现代化的其他文明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以民主为世界性基本取向的今天，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哲学还有没有意义？民主化的浪潮下，是否必然带来西方文化和价值的世界化？

我们可以将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视为对这样挑战的回应。

现代新儒家承袭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同时吸纳了现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并试图在坚持儒家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溶进西方思想体系的一些内容，如民主、科学等，使儒家思想打上现代化意义。为消解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特别是政治民主的矛盾，现代新儒家进行的论述，突出强调了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意义等问题，其

^① 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1页，三联书店，1997。

对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保留与发展和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交流与融合等问题的挖掘与阐释，也有思想史的和理论的价值。但是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立场和理论存在根本的错误，其思想和观点也带来了负面的作用，这是应当不仅从政治上而且特别应当从学理上予以析清的。

关于现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文章，目前大多散见于一些报刊和讨论会的论文集中，在一些研究整个学派或思想家的论著中对此也有部分的涉及。这些严肃的研究都是应当认真借鉴的。

当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但不应否认的是，与上述简单肯定类同的是，许多批评失之简约。李明辉认为，许多批评以理论和思想在现实中的实现作为评价的标准，这也就隐藏着一种以成败论英雄倾向，他认为，在理论层面和事实层面来评价应当是不同的。^① 以成败论英雄的批评，确实在社会思想领域研究中经常见到的取向。固然不能同意将思想理论可以孤立于社会政治的现实，可以割裂开来讨论，但是应当承认思想理论的独立价值与标准有独立的诉求的正当性。

对现代新儒学的政治思想的系统研究，从理论和现实来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全面讨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这里的任务。本书主要注重的是对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基础的探讨，以讨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与中国思想传统关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传统思想基础是否可能；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传统思想基础如何可能。

本书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政治思想的基础即政治哲学上，主要以讨论对象的政治思想基本特性为出发点。在现代政治问题上，新儒家承认民主自由的前途和意义，同时坚持政治与道德的关连，

^① 见李明辉之《儒学与现代意识》中有关论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反对将政治同道德的割断，认为政治不是外在的，而是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政治之本就是道德，就是天理。政治研究不是冷冰冰的“科学”，而是关乎人生意义的价值问题。因此，现代新儒家的视域主要不是现象的政治，它的关怀所在是政治的“所以然”的问题，是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根源和政治的终极目标的问题，进一步具体地说，就是现代政治的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问题。

对新儒家的政治思想的讨论，首先从这里开始。

在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传统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概念经常是在与现代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但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远不是断裂而正是其延传。希尔斯这样论传统：“几乎任何实质性的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① 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统的功能与价值。在希尔斯所说的这些传统类型中，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精神范型”、“信仰或思维范型”，这是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詹姆斯·西瑟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一个最重要的、永远起作用的制约因素是它的道德习俗。一个民族道德习俗的总和——在这一道德习俗具有一种可加辨认的形式的地方——被不同地称之为民族‘精神’、‘民族性’、民族的‘整体精神’，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② 西瑟又说，“精神这一概念（甚至在这里使用的）与其说是用来解释一种建构政府形式的行为，不如说是用来确立一种立法者在特定环境中面对的占统治地位的现实。”^③ 充分肯定具有传统特性的政治精神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

① 希尔斯：《论传统》，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詹姆斯·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③ 詹姆斯·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在我们要考察的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对传统的价值的着力维护，是其重要的特征。在这里，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道德价值与政治事实、理论与现实等等的复杂关系都以此为中心展开，而它的价值和局限，也被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引起我们关心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家传统的继承并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的尝试，成功的几率究竟有多少，如果有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现代新儒家主要是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本书对此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理论的层面。然而这个问题，又不仅限于现代新儒家和政治哲学了。

现代新儒家虽然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它的被视为一个思想流派，主要是以 1958 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标志。余英时对于新儒家的概念有一个讨论，他认为，新儒家有三种意义，一是从一般地说认同儒家者，这个概念过于宽泛而没有实际意义；第二种意义是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者，这个概念有较大的涵盖面；第三种意义是现在“海外流行的本义”，以熊十力学派为主要特征。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署名作者中，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均是熊十力的弟子，宣言中特别强调的中国文化的神髓就是“心性之学”的基本看法，正是熊十力的基本观点。因此“严格地说，新儒家主要即是指熊十力哲学流派。”^①

余英时突出强调了现代新儒家思想和理论的核心特点，这是很有见地的，本书的讨论将充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的概念的界定，似乎有些失之过苛。我倾向于所说的第二种意义，它可以包涵目前国内国外比较清楚地归入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人物。当然，限于论题的范围和预定目标，本书也主要以

^①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54~5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余英时因此认为，新儒家只是一个学派性的概念，包括钱穆在内的一部分重要的人物不能包括在内。余英时的看法实际上同样也反映出其一种“学派性”的偏见，因此并不被广泛认可。

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为对象，同时也涉及其他一些新老代表人物。

现代新儒家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形成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其政治哲学主要问题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发生有直接影响，或者说，梁启超对欧洲文明的批判和对中国文明的宣传是激活儒家思想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形成中，应当注意到梁启超的存在和意义。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鼓吹立宪政治，宣传宪政民主理论，张君劢是政闻社的成员，是梁启超宪政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张君劢，宪政的理论与新儒家的心性论相结合，构成了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方面。

在梁漱溟、熊十力一代的主要以文化为观照对象的时期，对于政治哲学还没有有意识的构建，梁漱溟干脆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根本不同的路向，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而在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社会基础遭到破坏，解决的方法是以中国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精神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重建。熊十力主要以本体论建构为目标。然而，梁漱溟、尤其是熊十力的文化哲学和哲学本体论奠定了后来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基础。

现代新儒家有意识地对政治哲学的规模化和系统化理论建设主要是第二代新儒家进行的，其政治哲学的主要理论框架，主要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张君劢确立，其标志有二：

一、1949年6月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逐渐形成以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为中心的“要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涵，改变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成为相助相即的关系”的现代新儒家政治理论中心；^①

二、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联名发表的

^① 徐复观：《“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敬悼雷傲寰（震）先生》，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下，320页，萧欣义编，台湾学生书局增订再版，1988。

《宣言》，系统表述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和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

构建新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著作，除梁漱溟和熊十力的论著外，还包括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唐君毅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人文精神之重建》，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国思想史论集》、《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和一系列论文，这些是现代新儒家重要的政治哲学文本。张君劢曾经自述“一生兴趣，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虽然对现代新儒家的形成发展起作重要的作用，但在 1949 年以前主要精力还在政治，其后才比较专心著述，作为新儒家阵营中较多进行实际政治制度的构想和设计的人物，也很值得重视。当然，张君劢明确的复归儒家是在 1949 年以后，此前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设计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其思想逻辑，需要进行某种推演性的分析。此外，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刘述先和新一代的林安梧等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作为一个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已经有了较为长期的发展，新儒家阵营的人物都著述甚多，研究者面临着的著述资料搜集和梳理的浩繁工作，就个人的能力和视野，只是就所讨论的政治哲学的问题考量资料。同样地，依问题对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基础的讨论，大体上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张君劢为主，并旁及其他一些与论题关系较为密切的现代新儒家。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是有其差异的，这里既重其“异中之同”，也对“同中之异”作一些比较，更进一步地是对共同的理论预设和思维模式有所探讨。另外，本书在叙事上不取编年史的方式，而企图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讨论，因此对于新儒家各代表人物和思想，也就所讨论的问题，有所分别和侧重。

本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分析和讨论，初步对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特征作出描述，并通过讨论对于中国的政治哲

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的问题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本书作者需要表达一个主要看法是，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它既是文明进步的连续，同时也反映着某种断裂。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以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基础，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折中，虽然需要对其现代的或者干脆是西方学术理论的解释，需要某种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汇，但是，对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在其内部革命性变化基础上的重构。

我们试图在论题中说明这个看法。现代新儒家注重政治的基本价值，注重传统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其讨论的问题和所引出的问题的确有着理论上的意义，但是建立在“心性论”的核心价值之上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主义”模式的传统特性，在实践上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和现实社会政治也难以建立必要的关联，以此为基础的新儒家政治思想构架的现代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儒家传统在现代新儒家这里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和理论贡献可以表示尊重，但不得不认为从新儒家的理论路向上，在对于传统思想价值的继承中使之社会现实化是很困难的。

虽然对于新儒家面临的和着力解决的复杂的问题，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很简化的，尽管如此，简化的评论结论也许还是必要的，需要指明的是它的有限性。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边缘的位置，其理论视域和基本问题都需要清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界定和阐释、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概念与中国思想的比较和作用，都是必要而繁重的。因此，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本书只是对于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日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的工作。

二、政治哲学：概念、意义和范围

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本书的研究问题。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对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和范围作出初步的界定，以使我们的问题有基本的参照。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人们对于政治的思考有着漫长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政治的思考与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其对宇宙和生命的总体思想密不可分的，因此政治学与宗教、哲学、伦理学、历史和法律纠结在一起，相互间没有划定各自独立的范围。而现代的政治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有职业的研究人员，在大学建立基地，设立课程，建立研究机构，换句话说，现代政治学是职业化的和专业化的。

政治学的现代发展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政治学的现代发展受到科学的极大影响，以实证科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为基本倾向，并且以“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别作为基础，并且以此立场否定政治哲学的意义。因此，从知识体系来说，传统的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之间与其说是连续不如说是断裂更为恰当。这种断裂是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变化的一个结果。政治学被分为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两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划分和界定正反映了政治学的断裂。

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政治哲学是与政治学从其他领域分化出来的过程而被确定的，而政治学的独立化则是社会科学的经验化和实证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在对政治学的对象和范畴的确定中，政治哲学开始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类型和部分，W. W. 威洛比这样对政治学进行分类，其一是“决定根本的政治原则”；其二为“描述政治机构、或静态的政府机构”；第三是“决定政治生活和